

## “传古”理念与侨居生活：近代出版史上的罗振玉<sup>\*</sup>

庄 帆

**摘 要：**以往学界研究近代史学转型多重视新史料的发现，较少探讨新史料的传播即出版的层面。罗振玉于出版新史料有开拓之功，却并非为了服务新史学，其独特的个人理念、印刷技术选择以及生活状态塑造了其刊书的样貌并推动学术变革，要理解这一现象就需要结合学术史与印刷出版史两个视角。罗振玉的学术出版深植于其遗老立场与清代学术传统之中，一方面建构故国沦亡、文物流散因此刊书留待后世的“传古”叙事，另一方面传达其区分古文之学与古器物学的独特学术理念。在印刷技术上，罗振玉一方面以一套丛书采用一种印刷方法的方式实现规模化操作，另一方面又在复制古籍时重视文字和文本的准确再现，体现出小学、校雠学观念和经济考虑的协调，其动机超越了趋新或守旧的简单划分。由于侨居日本，罗振玉还得以利用日本和国内各自的印刷技术优势，实现出版流程的跨国化，彰显出明清学者私家出版和近代新式出版社都不具备的特征。罗振玉的出版事业中个人理念、传统观念与新的生活方式和技术手段之间的交融，展现出近代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有机延续。

**关键词：**罗振玉；印刷技术；学术史；出版史

DOI:10.11714/jssu.sse.202605009

### 导言：学术史与印刷出版史的交汇

史料类型的扩充以及史料观念的变化是近代中国历史学的一大变革。流传甚广的近代史学“四大发现”之说，即是以新史料作为新史学的表征<sup>①</sup>。新材料确实激发了新观念、新方法，但其中还有一层，即新材料是如何传播、如何被读到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出版的层面。在“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汉晋简牍、内阁大库档案之中，除了殷墟涉及到考古现场发掘之外，绝大部分情况下，学者所面对的新史料实际上并非原物，而是出版物。探究这些出版物的诞生过程及其蕴含的观念，才能进一步理解这一史学变革的渊源。因为，出版者和读者的观念并不一定一致。

罗振玉在“四大发现”的出版中都有开山之功，其秉持的学术理念和民国提倡“新史学”的学者们差异很大，却对后者有深远影响。1921年顾颉刚读到罗振玉“在日本编印的图谱”即甲骨文、敦煌文书等新史料，决心要“建设真实的古史”<sup>②</sup>。傅斯年、钱玄同、胡适、鲁迅等人，都有意搜集罗氏编刊的各类图

<sup>\*</sup> 收稿日期：2025—12—02

作者简介：庄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① 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83页；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372—407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3—44页。

书,留意甲骨文、金石文字乃至日本古写本等新出资料,以至于改变了自己的学术观点<sup>①</sup>。国际学界同样关注罗振玉的出版物,除了与罗氏有直接交往的沙畹、伯希和等人外,罗氏1916年书信中的一句话也可佐证:“美国图书馆近来东采办书籍,弟所刊书,皆购一分以去。”<sup>②</sup>然而罗振玉作为清朝遗老,从政治立场到学术观念都不同于民国新史学或西学。同时,罗振玉以运用珂罗版、石印等新出版技术影印新出古文字、古器物而著称,印刷技术的选择塑造了其出版物的面貌,又恰好与近代史学重视物质史料的发展趋势相应,成为史学变革中的物质动因。如何理解罗振玉与其时代的差异和趋同以及这些同异如何塑造了其出版实践,最终影响了史学转型?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结合印刷出版史与学术史两种视角<sup>③</sup>。

在近代印刷出版史的论述中,罗振玉处于与其影响力并不相称的边缘位置。原因在于,既往研究视野侧重技术进步和新式出版机构的发展,在讨论出版界的知识精英时,也更重视推广新文化的群体<sup>④</sup>。罗振玉虽采用新印刷技术刊行新资料,但并非出于推动进步的技术主义意图或普及新知、启蒙大众的动机,同时作为个人出版商,其印刷实践有别于新式出版社,因此成为近代出版史中缺漏的一环。若拉长目光,将罗振玉置于明清以降学人私家出版的历史脉络中,反而更容易理解其出版实践的策略考量<sup>⑤</sup>。韩国学者孙修曠研究明清时期学者出版的论点,也适用于罗振玉:当时学者出版自己的著作时,并不像后世研究者一样将印刷术视为比手写更优越、进步的手段,也并不将印刷书籍的发展理解为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学者私家出版的热潮与其说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不如说是学者们“对(技术)调用的精心选择”(a deliberate choice of appropriation)的结果<sup>⑥</sup>。罗振玉可以“调用”的新技术当然多于明清学者,但是

① 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②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6年5月10日),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2页。按,此文献后文只简注文献名称。

③ 关于印刷出版影响学术的研究多以清代学术为重点,研究成果主要有:[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9—119页;徐雁平:《〈说文〉著述与测定学术风气的指标》,《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21—363页;井上進『明清學術變遷史——出版と伝統學術の臨界点』,東京:平凡社,2011年。关于晚清民国时期的研究则多侧重报刊、西学书籍等新型知识媒介对学术转型的作用,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58—339页。

④ 见[美]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著,张志强等译,郭晶校:《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苏精:《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Robert Culp, *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关于石印术的研究较多论及新技术如何推广传统文化,见杨丽莹:《浅析石印术与传统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以上海地区为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llotype Reproduction of Antiquities in Modern China, circa 1908–1917”,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Modern Chinese Ar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p. 273–308。

⑤ 讨论明清学人私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美]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美]周启荣著,张志强等译,夏维中等校:《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Joseph P. McDermott, “Noncommercial Private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Joseph P. McDermott and Peter Burke eds.,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 1450–1850: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05–145; Suyoung Son,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⑥ Suyoung Son,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4–6。

其技术选择背后的理念和策略,尚缺乏充分研究<sup>①</sup>。

罗振玉的学术出版与其政治和治学理念息息相关,更和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侨居日本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只有回归到罗振玉的出版物本身,不将其作为新史料看待,而是视为寄寓精神、阐述学理的作品以及其侨居生活所形成的跨国交往的产物,才能突破以往强调技术和学科进步的视角,理解近代出版与知识转型的多重动力。

## 一、“传古”的话语与理念

罗振玉在《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后作跋自称“夙抱传古之志”,王国维也称罗刊书“惟传古之是务”<sup>②</sup>。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传古”,那么郭沫若所言“罗振玉的功劳即在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sup>③</sup>,自然不错。但实际上,罗振玉的学术出版多在辛亥革命之后,其“传古”既寄托着遗老的政治立场,也有着学理上的自觉考量,并非提供史料这么简单。这使“罗振玉的‘传古’”与同时代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影印古籍的工作形成差异。

### (一)流散与流传

张元济主持印行《四部丛刊》,既要面对“旧籍日就沦亡”的现状,因此选书追求稀见善本,同时又以“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为标准,尽可能收常见常用书,体现出新式出版社在求精与普及之间的权衡<sup>④</sup>。中华书局也推出了与《四部丛刊》竞争的《四部备要》,选书更加趋向实用与常见。与此相比,罗振玉刊刻古籍并非为了普及大众,因此也无需顾虑精英路线与面向社会的矛盾,而是建构了一种基于遗老政治立场的“传古”话语。正如王国维称清代的刊书家虽然有功,但是“皆生国家全盛之日”,而罗振玉处于“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因此其刊书可比在衰乱之际维持“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并非为了当世<sup>⑤</sup>。罗振玉在刊书的序跋中反复提及资料的散佚,将自己的刊书定位为一种抢救性质的工作,建构“传古”的叙事与话语,形成了一种“书籍的语义场域”<sup>⑥</sup>。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罗振玉刊书数量的高峰期——1911到1918年寓居京都时期所刊书籍中。在1914年的《秦金石刻辞序》中,罗振玉追忆自己从晚清就开始搜集秦代金石文字,彼时已是大收藏家的端方也有所留意,并和罗多次交流,还曾允诺将所藏秦代石权拓墨后赠拓本与罗。端方死于辛亥革命,罗在序中感慨“公之墨本亦竟不可得”,又提到陈介祺的收藏“今颇流入海外”,子孙不能世守,因此称:

① 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日]佐藤进:《珂罗版之路的开拓者小林忠治郎——以与罗振玉、董康、傅增湘的交流为中心》,王勇主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8—43页;李蜜:《罗振玉日本访书及刊行述略》,《文献》2016年第2期;陈开勇:《从〈悉昙字记〉到〈悉昙三书〉——汪康年、罗振玉、罗福苙刊行梵汉悉昙文献始末考》,《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王正华:《罗振玉的收藏与出版:“器物”、“器物学”在民国初年的成立》,朱渊清主编:《器物学与艺术史》,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31页;瞿艳丹:《影印〈大清历朝实录〉史事杂考》,《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4期;张鸿鸣:《维新以传古——罗振玉与近代印刷技术》,《印刷文化(中英文)》2023年第1期;Shana J. Brown, *Pastimes: From Art and Antiquarianism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pp. 103-120。

② 《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37函第3册,杭州:西泠印社,2005年,影印本原页码第6页;王国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54页。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④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张元济全集》第9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

⑤ 王国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153—154页。

⑥ 周启荣提出,书籍的格式、封面、附录、排版、纸张、装订等物质因素以及正文之外的作者姓名、题名、序跋、引语、插图、评注等文本因素,构成了“书籍的语义场域”(sematic field of the book),具备超越书籍内容的丰富含义。见[美]周启荣著,张志强等译,夏维中等校:《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第218—225页。

不亟集录,异日求如今之所获,或不可得……编印既竣,爰记当日与公燕语以为之序。濡豪揽素,凄怆满怀,盖不胜今昔之感,西州之恸也。<sup>①</sup>

罗序将文献散失和清室倾覆、友朋阴阳睽隔的“西州之恸”联系起来,为刊书注入缅怀故国故人的情感。

类似的感慨还可见于罗振玉1917年的《梦鄮草堂吉金图序》,文中先是回顾自己“少好古器”,从30岁到上海,后来任官京师,收藏渐广,辛亥之后移居日本,名家如盛昱、端方、陈介祺、吴荣光、刘鹗等的藏品流散,“充斥肆廛”,罗亦有所购入。罗氏编印此书乃是“鉴于前人著录未成而器已星散”,自己所藏多有珍品,因此“付之影印,以广流传”。罗序描述自己:

惟念余以忍死余生,殊方遁迹,抱器徘徊,辛苦著录。意园、匋斋所藏且不能保,此编所载异日将何所归?仰思畴昔,俯念方来,揽素缀言,为之长喟。<sup>②</sup>

罗振玉通过器物的“星散”来凸显编辑和刊行图录的紧迫性,同时再一次和自己作为遗老“忍死余生”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以古器散失隐喻故国不复,对自己藏品的未来也表示悲观。换言之,“广流传”的目的是为注定“星散”的藏品留下一份纪录,而图录最终留存,器物反而无处寻踪。罗振玉多次在序跋中强调这一点,如在1916年的《古器物范图录序》中称自己多年搜集古器物范,而“未获从容拓墨”,因此世人不得而知;不似乾嘉时期拓本众多,百年之后“器或已佚,而名得长存”。相比之下,自己的收藏“泯没不必待至数十年后”。出于对器物“泯没”的恐惧,罗氏编成此图录,“以广其传”<sup>③</sup>。在同一年代的《古镜图录序》中,罗回顾自己三十年来搜集古镜的经历,然而古镜“散亡垂尽”,只有“墨本幸存”,因此“集录之愿”愈发急迫。即使编成此书,罗氏仍然因为“尚不能尽吾之藏而流传之”而感到遗憾<sup>④</sup>。再到1918年的《梦鄮草堂吉金图续编序》,罗氏对于器物流散似乎更为豁达:

复自念言物之聚于所好,殆如风之聚箨,忽聚忽散,理之常也。今予谋弃而获存,处损而得益。

此诸器既入予斋,不可不谋所以流传之……此书既成,则以后器之聚散,亦听之自然而已。<sup>⑤</sup>

然而这种“听之自然”,必须建立在“此书既成”的基础上。反过来说,罗振玉也为自己的刊书赋予了可替代失传文献与器物的价值。罗氏的“流传”始终伴随着“流散”,即对器物 and 拓本散佚的过往和悲观前景的描绘,因此刊书只是一种抢救性质甚至补偿性质的工作,所谋的是“幸存”。这和作为遗老“无力回天”而只能尽力自保的处境构成了双重象征。因此,罗振玉反复强调文献和器物具有一种易于散失的脆弱性,相比之下,自己刊印的书籍则由于有副本而更容易留存。

换言之,罗振玉的“传古”更多针对的是时间维度上的流传后世,而非空间维度上的普及传播。比起新式出版社供给社会可用读本的需求,罗更为看重的是留下副本,即使数量不如前者,也能够对抗时间对器物与文献的侵蚀。例如1916年罗振玉与上海哈同花园合作刊书,准备出版自己所编的《殷虚书契后编》等书,由于上海方面坚持要以月刊的方式分期连载,罗氏在给王国维的信中抱怨这样做“虽印如不印”,认为上海“所印三百部,存世间者,得什一足矣”,反不如自己利用这一机会出一套“丛刻”,更有利于“传书”<sup>⑥</sup>。在罗氏心目中,月刊连载的形式虽然能够扩大印数和销量,但是极易散失,反而不如印数较少的丛书本,因其完整,更能流传后世。“传古”的理念与强调流散与流传关系的话语策略互相配合,使其刊书潜藏着一种深层的政治诉求,即文化的重建只有等到皇权秩序恢复之后才能真正实施,以此彰显清遗民的立场。

① 《秦金石刻辞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189—190页。

② 《梦鄮草堂吉金图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213—215页。

③ 《古器物范图录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205—206页。

④ 《古镜图录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211—213页。

⑤ 《梦鄮草堂吉金图续编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215—216页。

⑥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6年2月27日、5月10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5、82—83页。

## (二)古文与古器物

和政治上的寄寓相配合,罗振玉在出版中也倾注了特别的治学理念。其所刊书中最具新特色,也最为倡导新史学的学者们重视的部分,即是图录书籍,其内容既包括“四大发现”中的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汉晋简牍等文字史料,也有展现实物形制的殷墟器物、明器、佛像、古货币等。罗振玉曾批评清代对古器物的研究,“其器限于古吉金,其学则专力于古文字”,因此提出“古器物学”,与金石学并立,以考证器物礼制为目标,区别于研究文字的钟鼎款识之学<sup>①</sup>。这一治学理念始终贯彻在其刊书实践之中。

贯穿在罗振玉出版体系中的一条核心原则,就是区分文字之书与器物之书,这与其在学理上区分古文之学和古器物学相对应。1916年,罗振玉在《金泥石屑》自序中概述了自己刊书的4个大类,分别为“寰宇石刻文编”“集古遗文”“集古图录”以及无法归入前3类的“小品”。前两类专收文字,只是区分为石刻和青铜器铭文,对应金石学中的“石”与“金”。石刻数量多、篇幅长,因此按文体分类,而数量较少、篇幅也较短的铭文则从殷周到六朝按年代区分。“集古图录”则是“依物分类”的拓本或器物照片的图录书籍。可见,罗振玉的图录和其专收文字的“寰宇石刻文编”“集古遗文”互相配合,以图和文两种书籍,共同构成了“传古”的整体样貌<sup>②</sup>。从书籍具体面貌来看,“寰宇石刻文编”因墓志占比过高,难以单纯按文体分类,因此罗振玉更多以地域为限出版了“冢墓遗文”系列,此与清代金石学家整理石刻资料的目录、文录书籍没有实质差别。而“集古遗文”和“集古图录”这两类更能体现罗振玉的创新之处。

“集古遗文”的大宗是甲骨文和金文。这一计划的诞生,应当在1912年《殷虚书契前编》出版时。此书扉页由内藤湖南题字“殷虚书契”,背面有“集古遗文第一”字样,正文首页在标题“殷虚书契前编卷一”下方又有“集古遗文第一”<sup>③</sup>。而此书的前3卷之前已经在《国学丛刊》上分3期连载,并没有这一副题。1912年底,罗氏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已经编成《殷虚书契前编》,还计划续成《殷虚书契后编》,“拟专力于古金文字以及龟卜、陶玺、泉布,为《集古遗文》”,也可说明其萌生这一想法的时机正是整理出版卜辞<sup>④</sup>。此后1916年的《殷虚书契后编》,甚至晚至1933年才出版的《殷虚书契续编》,同样附带“集古遗文第一”的副题。1916年的《殷虚书契待问编》,由于是罗振玉自己手抄难以释读的甲骨文,乃取材于前、后两编,因此和《殷虚书契考释》一样不带副题,足见其谨严<sup>⑤</sup>。1917年印行的《殷文存》虽然是在上海哈同花园所办刊物《艺术丛编》上拆分连载,正文首页下方也标注“集古遗文第二”<sup>⑥</sup>。不过,罗振玉的计划前后也有变化。卜辞作为“集古遗文第一”没有问题,但是罗到了晚年(1939年)重新编订金文拓本,出版《三代吉金文存》,则重新标上了“集古遗文第二”,取代了《殷文存》,实际上也是将后者收纳其中<sup>⑦</sup>。另外还有1930年出版的《贞松堂集古遗文》,直接以“集古遗文”为书名而无序号,是因为涵盖了三代、秦汉的金文<sup>⑧</sup>。《贞松堂集古遗文》和《三代吉金文存》都是收录大量青铜器铭文的书籍,前者以摹写铭文和手写释文石印,后者则直接影印铭文拓本并加以编类。两部书都起源于罗振玉在日本时准备和王国维合作开展而未果的《金文通释》计划<sup>⑨</sup>。可见,罗振玉的“集古遗文”始自1912年在日本编印《殷虚书契》系列,基本计划在此后数年已经确定,而一直到晚年才颇具规模。虽然《金泥石屑》序称“集古遗文”会上溯

① 《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144页。

② 《金泥石屑》,《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13册,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第5305—5306页。

③ 《殷虚书契前编》,《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4册,台北:大通书局,1976年。

④ 《致缪荃孙》,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7函第5册,第7—8页。

⑤ 《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殷虚书契待问编》,《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4—7册、三编第3册。

⑥ 邹安主编:《艺术丛编》第8期,1917年1月(据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影印版,第2册,第365页)。

⑦ 《三代吉金文存》,《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17册,第6773页。

⑧ 《贞松堂集古遗文》,《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0—13册,台北:大通书局,1968年。

⑨ 参见两书序言:《三代吉金文存》,《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17册,第6741页;《贞松堂集古遗文》,《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0册,第4003页。

殷周、下探六朝,但实际上仍以三代为绝大部分。

罗振玉将甲骨文视为一种比周代金文更加接近仓颉所造古文的文字,以三代文字为仓颉初文的沿革变化。因此,无论是甲骨文和金文的区别,还是金文内部不同器形、不同时期的区别,都可以统一为仓颉古文的流衍。正如其《殷虚书契考释》所言,欲“考求古文之真”,必须“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sup>①</sup>。在这一逻辑下,“集古遗文”就不只是简单的古字汇集,而是构建一个可以上探仓颉古文的字形演变体系。由此,古文字具备一种独立于其载体介质的特征与价值,文字之书的刊刻以还原字形为核心目标,因此在影印拓本之外,罗振玉还采用手工摹写的方式,不像古器物之书更为重视影印。当影印技术无法准确还原字形时,罗振玉仍以呈现字形为首要考虑(参考本文第二节)。

古器物之书即“集古图录”则承载着罗振玉独特的“古器物学”理念。清代有学者意识到器物形制的重要性,如被罗振玉推举为先驱的程瑶田、吴大澂,又如著《两壘轩彝器图释》、在考释铭文之外兼及器形礼制的吴云,又如尝试“全形拓”的陈介祺等,在研究和记录器形的方法上皆有所推进。罗振玉有了更好的技术条件来记录和展现器物形制,与之相应的学理也有承接和超越清代学者之处。其核心在于,罗振玉认为古器物学的目标是根据古器物实物,以“目验”考证古礼制,将器物形制与经籍记载相印证,从而求得经义确解、更正后世经说之误。例如其在京都出版的《殷虚古器物图录》,是中国第一部针对某一具体考古遗迹的图录,但罗振玉在书中解说器物的方式仍是引据经籍、考证礼制,将出土器物与经文中的“疏匕”“筭”“恒矢”“磬”等一一对应,并视器物为制度的物质载体,与经籍文字相互印证。换言之,罗氏的古器物学,所追求的是还原经书上的三代礼乐制度,既非只关注铭文的金石学,更非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器物研究<sup>②</sup>。

古器物学的学理也塑造了罗振玉刊刻图录的整体面貌,使其与之前金石学的器物图录传统有所不同。罗氏图录与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乃至清代的《西清古鉴》《两壘轩彝器图释》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前文所引述的“依物分类”的原则。罗振玉曾经和王国维“论今日修学宜用分类法”,并称王著《释币》《胡服考》《简牍检署考》皆用此法,而自己“亦用之于考古学”:

撰《古明器图录》《古镜图录》《隋唐以来古官印集存》《封泥集存》《历代符牌录》《四朝钞币图录》《地券征存》《古器物范图录》《古玺印姓氏征》诸书。<sup>③</sup>

可见这种“依物分类”的原则除了便于分类刊刻图录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考证礼制的追求相配合。按照罗氏观念,一物即有一物之制度,因此一物一图录,和王国维一物一考释的做法是一致的。于是,“集古图录”作为一个整体,蕴含着古器物学的观念,与“集古遗文”“寰宇石刻文编”构成的金石文字之学从学理到出版实践上都形成了区分。罗振玉的“传古”也因此有了具体对象,且寄寓着其独特的学术理念。

罗振玉潜藏在“传古”刊书之下的学理考量,以分类出版计划的形式体现出来,其印行的大量书籍也由此形成一个成体系且有拓展性的整体。同时,其刊书承载着的“传古”话语与其作为清朝遗老的政治理念紧密结合,寄托着故国沦亡与文献、器物流散的心境。这与试图再造和传播古典文化、选书求全求备、参与商业竞争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新式出版机构差异明显。1918年,罗振玉曾致信张元济,称自己曾有撰《古名物图考》的计划,为了贴合对方思路还称此书即“新名词所谓名物字典”,且“关于国学前途甚巨”,因此推荐商务印书馆开展此计划,并聘王国维主持。张元济的回信却认为“目前社会程度

① 《殷虚书契考释》(1915年永慕园印本影印本),《殷虚书契考释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7页。

② 庄帆:《中外互动与内在渊源:罗振玉古器物学的本意与特质》,《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6期。

③ 《集蓼编》,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第62—63页。

相去过远”，此书“销路必不能多”，只能等“经营有余力”之后方能从事<sup>①</sup>。个人出于“传古”理念与学理的出版计划，与作为商业主体的新式出版机构之间的思路不合，由此可见一斑。

## 二、印刷技术的选择

王国维曾描述罗振玉参与出版流程的程度之深，“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种种“古学人所不屑为”的繁杂实务，罗氏“亲之”<sup>②</sup>。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罗振玉刊印大量新史料，其政治与学术理念皆不同于民国时期同样刊刻古书的出版机构，其理念如何影响印刷实务，或者说罗振玉如何通过亲力亲为来贯彻其理念？尤其是罗氏使用新技术究竟出于什么意图，对于出版史整体而言又意味着什么？罗振玉对于雕版印刷的坚持和对于石印术的批评，在以往被理解为新、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sup>③</sup>。理解新技术和旧理念的冲突和调适，当然是研究的目标之一，但在面对史料时并不一定要先入为主地带着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否则无论是罗氏还是同时代的新式出版社，都难免新、旧杂糅。真正需要探究的是，罗振玉是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的以及对待不同书籍使用不同技术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 （一）丛书与规模化操作

罗氏称：“传古之事，流传尤亟于考订。”<sup>④</sup>因此在获得新文献时，其刊刻技术的选择就无法仅根据文献类型，而是要兼顾速度与成本。从经济的角度，迅速出版也有利于作为个体出版商的罗氏尽快获得售书款项，填补成本，而丛书的规模化操作就成为一种便利的手段。

罗振玉所刊书中，大部分是以丛书的形式印行的。《中国丛书总录》中收录罗振玉编撰的丛书多达25种，其中18种是刊刻古书、写本为主，夹杂着自己和近人的著作，6种纯为本人著作，1种是罗氏身后遗稿。这些丛书中，除了《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是以刊布敦煌文书为限定主题外，其他丛书书目都是没有明确限制，名称也多冠以罗氏斋号或自号，如《玉简斋丛书》《宸翰楼丛书》《永慕园丛书》《云窗丛刻》《雪堂丛刻》《吉石龕丛书》《六经堪丛书》等。这些丛书所收录的大多是罗振玉购得或借来的古籍善本、古写本抄本或者晚近稀见书，内容庞杂，其中也有像《雪堂丛刻》（又名《国学丛刊》）这样一部分是刊刻古书、一部分是罗振玉、王国维著述的丛书<sup>⑤</sup>。

这些丛书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印刷技术，基本上一套丛书即采用一种印法。这体现出其规模化操作的特点。如《玉简斋丛书》《宸翰楼丛书》为木刻本，《永慕园丛书》《吉石龕丛书》《云窗丛刻》为影印本，《雪堂丛刻》《六经堪丛书》《东方学会丛书》《殷礼在斯堂丛书》为铅字排印本，等等。丛书所采用的印刷方式和其内容之间有一定关系，但并不严密。像《永慕园丛书》收录有《流沙坠简》《秦金石刻辞》《秦汉瓦当文字》这种包含大量古文字的书以及《四朝钞币图录》这种图录书籍，即用影印。《云窗丛刻》收录日本古抄本《尚书》孔安国传等书，亦用影印。

但并非所有古写抄本都用影印。即以敦煌文书而言，《鸣沙石室佚书》初编、续编以及《鸣沙石室古籍丛残》都是影印本，较能呈现书写字体原貌，但是《敦煌石室遗书》以及收入《东方学会丛书》的《敦煌石

① 《致张元济》，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7函第5册，第61页；《致罗振玉》，《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463页。

② 王国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154页。

③ 张鸿鸣：《维新以传古——罗振玉与近代印刷技术》，《印刷文化（中英文）》2023年第1期。宗小娜将使用摄影石印术视为吴大澂等金石学家更加注重器物“物质性”（materiality）的表征。见Shana J. Brown, *Pastimes: From Art and Antiquarianism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p. 67–72。

④ 《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5册，第2045页。

⑤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9—275、581—582、686、688页。

室碎金》、收入《六经堪丛书》的《敦煌零拾》,都是跟丛书中的其他书目一样采用铅字排印,只保留了文本。再以鲜见的近代著作而言,《玉简斋丛书》以木刻本刊刻了多部明清书籍,《雪堂丛刻》则用排印,专门复刻明清稀见书的《百爵斋丛刊》则采用了手抄石印的方式。由此可见,在大量刊布文献时,罗振玉采用规模化的印刷方式,凑齐一批待刊书籍即出一套丛书,采用一种印刷技术,并不执着于固定的一种,由此可以节省人工、材料乃至沟通的成本。而印刷技术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以丛书整体为首要标准,而非对应某种文献类型。罗振玉作为个人出版者,同样需要考虑成本,但其思路不同于商业出版机构之处,在于其印书册数少、定价高、流传不广,难以通过经营回收成本,只能在刊刻阶段就尽可能兼顾出版理念和成本控制,因此才会形成这种规模化的丛书体系。

而罗振玉刊书的技术选择中仍有用丛书这一因素尚未能解释的,即罗对影印技术的态度。

## (二)复制古籍的核心需求

罗振玉对石印技术的批评令人瞩目。1917年底,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事者姬觉弥计划出版一批四库未收书,委托王国维主持。王致信罗振玉提及此事,罗回信中建议“印行小学书”,并且认为使用雕版印刷“甚善”,建议“古本者宜照原本影写上木”,即传统的影写覆刻方式,而非石印、珂罗版等影印法。然而王国维回信称,姬觉弥不满意于雕版速度迟缓,因此尚未决定。罗又回信认为“可笑可叹”,因为不用雕版则只能用活字或石印,而“满纸篆文古字,将一一刻木活字”,十分不便。若用石印,则罗问道:“沪上石印,精乎否乎?古刻漫漶,用石印,精乎否乎?”表现出对上海石印技术明显的不信任<sup>①</sup>。这并非罗氏独有的观点,以往研究者已经指出近代藏书、印书者中很多人批评石印技术的缺陷,认为反不如传统覆刻<sup>②</sup>。这种现象固然存在,但是仍然需要结合罗振玉刊书的具体实践来分析。

罗振玉对石印的不信任,应当放在其对复制古籍一事的整体理解中来看待。对于石印技术的另一种重要应用,即所谓“手写上石”,快速影印手稿,罗氏并未批评过,而且大量使用,尤其是在书籍的序跋、图录的解说处。上引批评实际上是针对复制古籍的需求而言,即是在与其他影印技术如珂罗版、金属版以及传统覆刻的比较之后。珂罗版(罗称之为“玻璃板”)成本高昂,能够实现高精度影印,罗氏用这一技术刊刻了多部质量精良的图录。罗对珂罗版非常推崇,唯一的阻碍是经济<sup>③</sup>。石印质量不如珂罗版,自不待言,对于罗氏而言石印从来就不能与珂罗版相比,其真正的比较对象,如上述给哈同花园印行“小学书”时所示,是包括覆刻在内的雕版印刷。罗振玉为何认为雕版比石印更适合于复制古籍?这仍与其学术理念有关。

罗振玉的理念可以从其对影写本的态度中看出来。在罗振玉的刊书实践中,手工摹写的影写本占据着特殊地位。清末民初是一个古写抄本大量出现的年代,无论是杨守敬、董康等人在日本访书之所获,还是敦煌文书中的残卷,都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见到原件,因此有条件者则影写录副,以俾收藏流通。罗振玉在搜集和研究古写本时,也接触到了不少影写本。影写本固然不如原件,但是罗振玉在出版时也并不排斥,而是先就获得的影写本刊行之。如1910年,罗振玉从杨守敬处获得《隶古定尚书》唐写本一卷,是杨氏在日本所获原件的影写本。罗后来又从伯希和处获得两卷《隶古定

① 王国维和姬氏等人反复沟通后,并未说服对方,最后仍定为以活字排印为主,雕版为辅,王也因此决定不刊小学书而转为其他类别。见《罗振玉致王国维》(1917年12月12日、1918年1月2日)、《王国维致罗振玉》(1917年12月21日,1918年1月4日,1月18日,4月3、4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15、326、319、327、333、363页。误字据罗振玉手稿更正,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042页。

②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瞿艳丹:《影印存真:中国近代的珂罗版印刷技术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58页。

③ 如1912年罗振玉致缪荃孙信中谈到:“明年夏初当成《后编》,计六卷,力不能再玻璃板矣。”见《致缪荃孙》,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7函第5册,第7页。1916年其致王国维信提及:“古匋文字可用石印……若玻璃板至佳,则力又不支也。”见《罗振玉致王国维》(1916年6月7日夕),《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97—98页。

尚书》的照片，与影写本互勘，撰成《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商书）》<sup>①</sup>。1914年，罗又把杨氏影写本收入《云窗丛刻》中影印出版。罗振玉在清末访日时就留意日本古写本《文选集注》，苦于无法看到原卷，只好“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这批影写本归于董康，罗劝董刊行，后来自己收入《嘉草轩丛书》，与所购得的两卷原卷一起，于1918年影印出版<sup>②</sup>。又如日本所藏古写本《玉篇》残卷，黎庶昌在清末时已经刊入《古逸丛书》之中，罗振玉1915年秋在小川为次郎处见到原本，和黎刻比较后发现黎刻本“笔意全失”，推测其乃“展转传摹上木”，即所据为影写本，“未得见原本也”。而且黎刻本颇有校改，有些原件可以辨认的字，经过校改反而不可识别。尽管如此，罗振玉仍然认为黎刻本的问题在于所根据的摹本“未尽善”，因此其校改之后反而更加“精确”，“可见当日校刊之慎密”。因此罗认为即使刊行原卷，也应将黎刻与原本“并行”，“以资互证”<sup>③</sup>。罗振玉对影写本的重视程度还可以从《鸣沙石室佚书》的重版看出来：1913年初版是根据原卷影印，到1928年再版则是“精模付诸石印以广其传”，一方面降低成本、扩大印数，另一方面也可见罗氏对古文书所重乃在文本、字形，因此清晰的影写本比模糊的原卷影印更具流传价值<sup>④</sup>。

罗振玉刊布“集古遗文”的方式也可以佐证这一点。《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都是用珂罗版影印，罗氏认为此前、后编出版成本“可谓奇昂，然印刷则至精”<sup>⑤</sup>。影印内容是罗振玉亲手椎拓的甲骨拓片，比起1911年《国学丛刊》的石印本，在笔画细微处更显清晰。而在此前、后编出版中间的1914年，罗还印行了仅有十来页的《殷虚书契菁华》，则是直接对甲骨原物拍照后以珂罗版影印，因此能够显现出骨片整体形状而非剪裁整齐的拓片——但这并非罗氏采用此法的原因，而是由于这批甲骨“骨质至脆”，无法拓墨<sup>⑥</sup>。可见罗氏认为，能够呈现笔画的影印精拓，仍要胜过直接拍照。1931年罗振玉在《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自序中批评阮元、吴云等著录金文用摹写，“不无违失”，而“影印视模写为得真”，看似与前述分析矛盾，实际上罗氏所强调的并非整体的影印技术，而是非常具体的“选墨本尤精善者，影照精印”，仍然是为了清晰呈现文字。而因为“资力所限”，《贞松堂集古遗文》及《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仍然采用了摹写印刷的方式<sup>⑦</sup>。

由此可见，罗振玉复制古籍的核心需求在于准确复制文字与文本，更接近一种小学和校雠学的追求，而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文献学和版本学。因此罗不但不排斥古写本的影写本，还重视已经有过一番校勘工作的摹本的价值。对于珍稀善本亦如此，如《玉简斋丛书》《雪堂丛刻》和《百爵斋丛刊》三套丛书都复制罕见书籍，分别用了雕版、活字排印和手抄石印三种技术。这些都是完全放弃对原书的版式、字体等信息的保留，而仅传递了文本。上述哈同花园刊书一事，罗氏之所以坚持用雕版而不赞成石印，也正在于所印为“满纸篆文古字”的小学书，若石印不精，容易失真变形。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是在活字排印成为主流的民国时期，雕版印刷已经成为高阶、小众的追求，时间和经济成本都相对较高，王在信中也承认“殊太昂贵”<sup>⑧</sup>。再加上罗氏有长期合作的、著名雕版写手饶星舫，所以对雕版质量很有信心。换言之，罗振玉对石印的批评，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是对影印的批评，认为低质量的影印还不如高质量的本刻。这并非出于某种守旧的趣味，而是实际的学术需求。

① 《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商书）》，《国学丛刊》第3期，1911年7月，单篇页码第1页。

② 《日本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340—341页。

③ 《古写原本玉篇残卷跋》，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334—335页。

④ 《鸣沙石室佚书》，1928年，罗氏自印版，“序”第2页。

⑤ 《致缪荃孙》，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7函第5册，第7页。

⑥ 《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罗氏自印版，序文，无页码。

⑦ 《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3册，第5291—5292页。

⑧ 《王国维致罗振玉》（1918年1月18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33页。

罗振玉“传古”的“古”,在这个意义上当理解为具体的古文字和古器物,而非泛泛作古文献解。因此在复制古籍时,罗对印刷技术的选择以还原文字写法原貌从而传递准确文本为核心,文书本身状态、形制等皆在其次。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罗振玉要以活字排印的方式来刊刻一部分敦煌文书和明清书籍。后世研究者处在一个文献学和印刷技术已经相对发达的年代,对于古书的细节把握的要求远高于罗振玉的时代,因此当然更信赖影印。在文献学、版本学的眼光看来,即使是低质量的影印,对于书籍原貌的保留也要远高于重新雕刻或手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罗振玉并不这么看,他的“传古”并非文献学和版本学意义上的,如其所言:“金石之学,当以传录文字为最要,考证其后也。”<sup>①</sup>

### 三、侨居生活与跨国出版

罗振玉自辛亥革命之后东渡日本寓居京都长达8年,并刊行大量重要著作与史料,其侨居海外的生活状态在两个层面上塑造了其出版事业:一是得以利用日本的印刷技术和珍稀典藏;二是出于个人经济原因以及技术便利因素,罗振玉搭建了一种跨国化的出版流程,展现出近代知识与出版转型中跨国因素的重要性。

#### (一)日本的印刷技术

近代中、日两国在文献与出版领域交流频繁,黎庶昌、杨守敬、董康等人在日本寻访罕见古籍并刊刻出版,在晚清带动了访书日本的热潮<sup>②</sup>。与此相对,日本学者如岛田翰、内藤湖南、长则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人也在中国广搜图书,两国围绕汉籍的交流促进了各自学术的变化<sup>③</sup>。罗振玉与杨、董皆有交往,又长居日本,在披露日本所藏珍稀文献上也多有贡献<sup>④</sup>。但像罗振玉这样除了利用异国文献外还运用异国印刷术以刊书者,实属鲜见。

罗振玉在清末已经体验过日本印刷技术的先进,且有过与日本出版商合作刊书的经历,为其后来寓居京都时期的大规模刊书奠定基础。早在1902年访日考察时,罗振玉就曾参观东京印刷株式会社,感叹日本先进的印刷技术“即日本文明进步之明征”<sup>⑤</sup>。晚清时邓实等人曾以网目铜版和珂罗版技术在《神州国光集》传播图像,罗也参与其事<sup>⑥</sup>。1909年,罗振玉与田中庆太郎合作,在东京文求堂出版了《唐风楼藏三代吉金文字》<sup>⑦</sup>。此书用金属版印刷,一共24页,刊布罗振玉所藏的《毛公鼎》《孟鼎》等铭文拓本,是罗振玉第一次尝试以照相制版、影印技术刊印自己的藏品。印刷工作由东京金属版印刷合资会社的七条恺负责。罗振玉在1909年赴日考察时结识七条恺,曾至其公司观看印刷样本,还体验了写字后当场制版印刷的快速流程<sup>⑧</sup>。在此前后,罗振玉正好开始尝试刊刻丛书、复制古籍,如1910年刊成的《玉简

① 《蒿里遗文目录》,《国学丛刊》第2期,1911年5月,单篇页码第1页。

② 参见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の研究—清国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王宝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

③ [日]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译:《中国访书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④ 李蜜:《罗振玉日本访书及刊行述略》,《文献》2016年第2期。

⑤ 《扶桑两月记》,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第118页。

⑥ 瞿艳丹:《影印存真:中国近代的珂罗版印刷技术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54—157页。

⑦ 此书由于印数较少,此前受研究者关注不多。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等处有藏,都编目书名为《三代吉金文字》,田中庆太郎编。罗氏《雪堂校刊群书目录》、罗继祖编《雪堂著述总目》(见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37函第3册)以及囊括罗氏著述、刊印诸书的《罗雪堂先生全集》皆未收入此书。王正华没有注意到此书,因此称“终清之世,罗振玉都未曾亲身出版自己的收藏”,有误。见王正华:《罗振玉的收藏与出版:“器物”、“器物学”在民国初年的成立》,朱渊清主编:《器物学与艺术史》,第12页。

⑧ 《扶桑再游记》,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第139—140页。

斋丛书》以及因辛亥革命而中辍的《宸翰楼丛书》，都是以雕版重刊或影刊，而非影印。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1909年与日本出版商合作的经历对于罗振玉日后使用影印技术而言有重大意义。

寓居京都后，罗振玉对日本印刷技术的利用更为直接便利，其所使用的技术主要是小林忠治郎的珂罗版制版与印刷。小林是明治时期著名出版商、博文堂第二代店主原田庄左卫门的三弟，曾与其排行第二的兄长小川一真共赴美国学习照相制版与印刷技术。回国后，小林在京都开设小林照相馆和照相制版所。根据研究者梳理，罗振玉在京都期间所刊行的珂罗版书籍，全部都由小林照相制版<sup>①</sup>。1916年，罗振玉在给王国维的信中称在狩野直喜处见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卷子《尚书释文·帝典》的铜版印本，“今日令小林影写”，又借到早稻田大学所藏《礼记子本义疏》，同样“拟影印”<sup>②</sup>。可见罗振玉在日本得见珍稀文献时，可以直接让小林照相以备出版，取近水楼台之便。

罗振玉与小林忠治郎以及博文堂的合作不止在出版领域，还包括文物交易，这就涉及到其侨居生活的收入来源问题。正如王国维所说，罗振玉在海外为了刊书，“鬻长物以自给”<sup>③</sup>。罗振玉在日本出售珍贵书画、器物时，往往也力促其出版，以广流传。例如1912年罗振玉将南唐刻《澄清堂帖》拓本、宋刻《甲秀堂帖》拓本售与大西行礼时，就先将拓本交由博文堂影印出版<sup>④</sup>。罗振玉在京都期间将自己的古玉收藏出售给上野理一之后，原本上野氏也准备拍照影印，图版制成后因1919年上野突然离世而未成书，直至1926年才出版，罗振玉仍为此书撰写了序文<sup>⑤</sup>。可见罗振玉的出版事业与其维持侨居生活的经济来源，当然也包括刊书成本来源，有着紧密的联系。

除了京都的出版商，罗振玉仍不时将需要金属版印刷的书籍委托给东京的七条恺，虽然频率和重要性不如京都的珂罗版。例如1914年编印《流沙坠简》时，为了降低成本，罗振玉采取的方法是简牍图片采用珂罗版，罗振玉、王国维所撰考释文字则用金属版。又如在1916年和上海哈同花园合作刊书时，罗振玉在信中抱怨“东京金属版”印刷迟缓，京都珂罗版价格虽贵，却“便捷多矣”，因此近来印书“仍在京都用玻璃板印”，称“东京商人更远在京都之下”，可见珂罗版印刷的速度也是罗氏看重的因素之一<sup>⑥</sup>。

值得注意的是，罗振玉即使身在日本，也未与国内的印刷术隔绝。通过王国维等居住国内的友朋帮助，罗振玉得以委托有名的雕版和活字专家写版、制版。例如写仿宋体的名手黄冈人饶星舫、陶子麟以及发明“聚珍仿宋版字体”的丁辅之，都与罗氏有过合作。1913年，已经身在京都的罗氏致信寓沪的缪荃孙，借其所藏元人诗集四种准备刊刻，请求“赐交饶君缮写”，之后又称赞“饶君写书，甚速且佳”<sup>⑦</sup>。1914年罗振玉所编印的《宸翰楼丛书》，实际上是其清末时在北京取藏书中的宋元刻本“影写付鄂中雕版”，后来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未果，移居京都后其对书目又有所增补，才刻成这部丛书。据研究者从字体特征判断，《宸翰楼丛书》的写手应为陶子麟<sup>⑧</sup>。1917年底至1918年初，罗振玉协助哈同花园刊行四库未

① [日]佐藤进：《珂罗版之路的开拓者小林忠治郎——以与罗振玉、董康、傅增湘的交流为中心》，王勇主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第27—29页。

②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6年8月16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37页。

③ 王国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154页。罗振玉在京都期间的文物交易研究，参见洪再新：《自立于国际艺术市场上的“遗老”——试论罗振玉流亡京都期间的学术建树与艺术交易》，《新美术》2010年第1期。

④ 参见罗振玉：《甲秀堂帖跋》，《宋拓甲秀堂帖》，大阪：油谷博文堂，1912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电子版：<https://dl.ndl.go.jp/pid/852910>，无页码；[日]内藤湖南：《澄清堂帖跋》，《南唐拓澄清堂帖》，大阪：油谷博文堂，1912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电子版：<https://dl.ndl.go.jp/pid/1185430>，无页码。

⑤ 参见罗振玉、内藤湖南序文，浜田耕作编《有竹斋藏古玉谱》，上野精一出版，1926年、ページ番号無し。

⑥ 《致邹安》，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7函第6册，第105页。

⑦ 《致缪荃孙》，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7函第5册，第12、14页。

⑧ 艾俊川：《且居且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9页。

收书时,也还是提议请饶星舫写版木刻,饶氏表示无暇兼任之后,罗又提出“可托饶君通信陶子麟”<sup>①</sup>。可见身处日本的罗振玉依然保持着和两位黄冈名手的合作。另外,1918年罗氏的序跋集《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以及辑佚编成《王子安集佚文》《临川集拾遗》,1919年撰《万年少先生年谱》《徐俟斋先生年谱》两书,等等,都是交给丁辅之以仿宋活字印行。

侨居生活给了罗振玉利用日本印刷术的便利,但便利只是考量因素之一。罗振玉质疑上海石印术不够精美,其比较对象正是日本的影印技术以及国内雕版、仿宋活字名手的技艺。而这种比较的背后仍以“传古”的需求为定夺标准。因此,个人理念与生活状态的交错共同造就了罗振玉对印刷技术的使用方式以及其刊刻书籍的面貌。

## (二)出版流程的跨国化

罗振玉刊书的实践具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即出版流程的跨国化,其利用中、日各自的印刷技术优势,将一部书拆分到两国的不同出版商处分工合作。例如1916年罗振玉打算增补《殷虚书契考释》,在给王国维的信中提到准备先将草稿寄给饶星舫以仿宋字体书写,再将写本寄给东京的七条恺以金属版“印百部”,等到第三次修正之后再使用雕版印刷。1921年,已经回国寓居天津的罗振玉在和商务印书馆协商刊行其金文拓本时,致信王国维提到自己的“海外办法”,即“雇一照相师,先将拓本照出,然后据影片类次”,无需将拓本寄到上海<sup>②</sup>。罗振玉在日本时即利用当地先进的摄像技术,先对拓本影照,再编排胶片并寄到上海印刷,而非直接邮寄拓本,以免邮费繁重或藏品散失。

1916年罗振玉与上海哈同花园的合作刊书就是其“海外办法”的典型案列。此年初,王国维离开京都移居上海,受聘于上海哈同花园所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担任杂志《学术丛编》的编辑及承担大学授课工作。同时,金石学家邹安也受聘为《艺术丛编》编辑。两份杂志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但是都有刊布古书的计划,而罗振玉也利用这两份杂志的空间以及背后哈同花园资金的支持,刊行了自己手头的一些文献。尤其是《艺术丛编》刊登了《殷虚书契后编》《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录》《殷文存》《古明器图录》《殷虚古器物图录》,皆罗振玉图录书籍之精华。

罗振玉为哈同花园提供可印书籍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把书寄给王国维,以供刊登出版。这主要针对《学术丛编》所刊载的罕见史料一类的内容。如1916年2月27日罗致信王,附寄多种文献,“请属妥人写之”<sup>③</sup>。如此则书籍直接在上海进入出版流程,从抄写到活字排版、印刷,都不需要罗氏再参与。第二种方式则是更为复杂的跨国出版流程,应用于刊登在《艺术丛编》的图录文献。罗振玉首先在京都挑选藏品,如甲骨拓片、古器物等,请小林忠治郎影照,再根据情况选择珂罗版或者转制金属版的印刷方式,印刷出足够的份额。因此,寄到上海的是印好而未装订的书页,以供下一步按照杂志的刊期安排来排序、装订成册。罗振玉致邹安、王国维信中提及印刷进度和装箱邮寄的信息甚多,例如1916年4月4日致函王国维称,“为景叔编辑《书契后编》及《古器物范》《隶草存》《金泥石屑》四书”,“景叔”即邹安。其中《殷虚书契后编》已经编次拓本并粘好,成上、下两卷,“今日上卷已照成,下卷二三日亦成”,即指照相制版。之后“俟钻线、印好、目成,即可成书矣”。而书页印成之后,即寄到上海,以便“在沪装订”。5月9日,罗氏在信中提到,“已将此间所印三书之上卷及两书之序共一百五十部”托邮轮带到上海。7月17日,罗氏致信邹安,提到已经寄出300份“《殷虚古器物图录》及封面序目”,只是所附的解说要“下月方能写定付印”。可见罗振玉在印出图片后即先装箱邮寄,而解说文字尚未撰成,则待写完付印

①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7年12月12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15页。

②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6年5月10日、1921年3月10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82、512页。

③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6年2月27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5页。

后再寄,其工作方式是随编、随写、随印、随寄,而最后的编次装订工作则留到上海处完成<sup>①</sup>。

1916年,罗振玉还与哈同花园合作印行了两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古书,即《悉昙字记》《天竺字源》,是研究悉昙文字的重要资料。罗振玉在京都大学吉泽义则处得见宽治七年(1093)《悉昙字记》古写本,即与邹安信中所称“北宋写本《悉昙字记》”。而《天竺字源》则是从东京博物馆借刊。一开始,罗氏误以为此书为京都大学所藏,还致信内藤湖南称,“上海西友拟借照一本”,请内藤告知此书页数,以便汇款<sup>②</sup>。之后得知此书藏所在东京博物馆,于是又拜托内藤居间联系。此后,可能是由于东京博物馆在答复罗振玉关于照相费时出了差错,导致哈同花园预算不足,罗振玉在给邹安的信中表示愿意自己出资印刷此书。而上海方面仍然坚持“彼此分印”,于是双方继续协商如何分摊照相费和印刷费等。9月26日,罗又去信称得知哈同花园方面300元的照相费已经付款,因此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并说明《天竺字源》是“托东友自己购玻璃片,由馆中照之”,因为必须由博物馆写真师影照,因此照相费更贵,最终是360元,罗表示愿意承担多出的60元。至于《悉昙字记》则罗氏已经垫付了照相费,并询问邹安是否直接在日本印刷:“若此二书由此印行,此款与印价同汇,否则将二书影本同寄奉可也。”可见,原本的计划应当是哈同花园负责全部照相费,由罗振玉雇工照相后将制成的影片寄给哈同花园,并在上海印刷。罗氏提议由自己在日本用东京金属版印刷,并列出了一份印数按300部计的预算账单。最后此书确实由罗氏在日本印成<sup>③</sup>。

这些沟通细节看似琐碎,实则向我们展现出罗振玉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利用跨国的资金与技术网络,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其“传古”的需求。无论是新式媒介如定期刊物,还是新技术如影印,对于罗振玉来说都不是一个新、旧的问题,而是如何调配不同资源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并不具备民族工业技术观念的罗振玉尽可能地使用跨国的技术和人脉资源,反而实现了新式出版社不一定能够达成的目标。

## 结 论

周绍明在研究明清私家出版时指出,中国作家和欧洲作家同样通过出版自己的作品来表达观点、影响舆论,但不同之处在于:欧洲作家——正如亲自参与过印刷流程的狄德罗所说——100个人之中有99个对出版事务感到厌烦,因此满足于只承担作者而非出版者的角色;而中国作家则更为关注书籍的呈现方式,通过刊刻来传达自己的声音与身份认同。这提示我们,在探究近代学术知识与印刷出版的共同转型中,需要聆听到那些无法单纯用技术进步和商业发展来理解的个人声音<sup>④</sup>。

罗振玉的刊书即是如此。其“传古”出版为学界提供大量新史料,成为史学变革的一股重要动力,但史料的成书并非机械的复制,而是承载着出版者的理念。罗振玉在所刊书的序跋中构建了一种故国沦亡与文物流散的叙事,赋予“传古”在传承古书古物的字面意思之下更深层的文化重建的含义。与这一话语相对应,罗振玉刊书也并非为了新史学而刊布新史料,其学术理念仍建立在清代经学、小学的逻辑框架上,创新之处在于区分古文之学和古器物学,前者通过甲骨文、金文追寻仓颉古文,后者则从器物形制考订三代礼制,打破了金石学的束缚。这一理念贯穿在“集古遗文”和“集古图录”两个宏大的出版体系之中。

① 《罗振玉致王国维》(1916年4月4日、4月29日、5月9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2、71、80页;《致邹安》,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7函第6册,第106页。

② 庄帆:《日本关西大学藏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信三十九封考释》,《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4期,第196页。

③ 《致邹安》,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罗雪堂合集》第7函第6册,第105—107页;王贵忱、王大文编:《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33页。

④ Joseph P. McDermott, “Noncommercial Private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Joseph P. McDermott and Peter Burke eds.,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 1450–1850: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pp. 143–145.

在印刷技术的选择策略上,罗振玉以丛书的形式刊刻大量书籍,一部丛书使用一种技术,既经济、便捷,又能贴合其拯救文献、留待后世的“传古”话语的需求。同时,罗振玉在复刻古写本抄本、古文字等资料时,对影印采取了一种灵活态度,在高精度也高成本的拍照影印之外还大量使用手写石印,在需要准确书写的场合还会选择传统雕版,同时重视影写本的价值,并未一味推崇新技术。这也与其“传古”重在古文字、古器物有关,难以用趋新或守旧来划分。侨居日本的生活状态是罗振玉得以灵活运用多种技术的前提条件。罗振玉通过日本的珂罗版、金属版技术,刊刻了甲骨卜辞、器物图录、敦煌文书等多种重要史料,并持续利用国内的雕版、活字印刷,形成跨国的出版流程,展现出中、日印刷技术与知识转型的交错。罗振玉的个人理念和生活状态塑造了其出版物的特殊面貌,在成为近代印刷出版史独特个案的同时,也汇入新史学的潮流之中,而其个人声音终为新浪潮所吞没和遗忘。

## The Idea of “Preserving Antiquity” and Expatriate Life: Luo Zhenyu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ublishing

Zhuang Fan

**Abstract:** Scholarship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emphasized the discovery of new sources, while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ir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Combin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with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Luo Zhenyu 罗振玉, a key figure in publishing newly unearthed materials, to show how his ideas, technical choices, and expatriate experience shaped his work. Rooted in a loyalist stance and Qing scholarly traditions, Luo's publishing was not aimed at serving the New Historiography. He framed his work through a narrative of “preserving antiquity” in response to cultural loss, while advanc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tudy of ancient writing and that of antiquities. His printing practices balanced scaled produc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extual accuracy, reflecting both philological concerns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His residence in Japan further enabled a transnational publishing process drawing on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technologies, setting his work apart from both late imperial literati publishing and modern commercial presses.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 ideas, traditional concepts, new ways of life,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Luo Zhenyu's publishing reveals how tradition was organically sustained amid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Luo Zhenyu; printing technology; history of scholarship; history of publishing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